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艺术、神话与祭祀

古代中国的政治权威之路

张光直 著

刘 静 乌鲁木齐加甫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艺术、神话与祭祀

张光直 著

刘静 乌鲁木加甫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3921

ART, MYTH, AND RITUAL by K. C. Chang

Copyright © 198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year)

by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翻印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神话与祭祀 / 张光直著; 刘静, 乌鲁木齐甫
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6. 12
(大家小书)

书名原文: art, myth and ritual

ISBN 978-7-200-12618-1

I. ①艺… II. ①张… ②刘… ③乌… III. ①文化史
—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2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9581 号

总策划 安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司徒剑萍 魏晋茹

责任印制 宋超

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

大家小书

艺术、神话与祭祀

YISHU、SHENHUA YU JISI

张光直 著

刘静 乌鲁木齐甫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79.35千字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2618-1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

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导 言

徐天进

张光直先生（1931—2001）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考古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嘉惠学林甚多，为学界所珍重。

张光直先生自小生长在北京，对中国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台湾大学就学期间师从李济、高去寻、石璋如、凌纯声等著名学者，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中国考古学基础。后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留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和Gordon Willey，接受了系统的西方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训练，此后长期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殊的求学经历和学术背景，使得张光直先生的学问可以中西融会贯通，而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独树一帜。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也进入了一个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张光直先生的学术成果恰好也在这个时期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分别是《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

物出版社，1986年）和《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张先生的这三本“小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多学科的方法及新颖的观点，在仍以文化编年和区系类型研究为重心的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年轻一代的考古学者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

《艺术、神话与祭祀》（*Art, Myth, and Ritual*，原辽宁教育出版社译本为《美术、神话与祭祀》）是张光直先生诸多学术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该书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稿为基础，选编而成。据张先生自己所说，他写这本书时所设定的读者不是专业学者，而是一般读者，“所以写起来比较令我兴奋，比较使我少受专业传统的束缚，也可以算是对中国古史研究的一种方式的一次试验”（张光直语）。该书的英文版于1983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8年出版了中译本。此后又相继有日文版和台湾的繁体字汉译版，均广受好评。

张光直先生对该书的写作目的在序言中是这样介绍的：“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前者是要讨论的问题，后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本书中张光直先生对当时争议很大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主要是夏商周的年代

和都邑问题，有些问题迄今仍没有解决）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态度，而仍以古典文献为主要参考，划定了夏、商、周三代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并以此作为全书所讨论问题的时空背景。

张光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对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主要是动物主题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作者明确指出，文明是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而财富积累的首要途径则是政治权力的行使。政治权力的生成又是亲属等级制度、统治者的道德权威、军事权力、交通上帝祖先之特权以及财富获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古代中国政治权威崛起的必由之路。几十年过去了，张光直先生所提出的观点仍闪耀着理性的光芒，照亮着我们继续行进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之路上。

对中国古史研究在社会科学一般法则上的意义或贡献是张光直先生格外强调的。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一文中，张光直先生从中国文明起源的个案研究出发，提出了“连续性”（中国的）与“破裂性”（西方的）两种不同的文明起源形态，并认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

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该观点自提出以来，似乎已成为张光直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见解而被广泛征引。

近年来，公共考古在中国方兴未艾，考古学家们正在尝试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去普及考古学知识，分享发掘和研究成果。张光直先生三十多年前就主张“中国的古史研究不属于狭窄的专业”，而主动以一般读者为对象进行写作，将精深的学问转化为大众容易并十分乐意接受的知识。我们通过阅读这本“小书”，不仅可以体会到一位学者对学术问题的敏感、求证过程的严谨和分析问题的深刻，同时也不难感受到一位学者的责任和温情。

由于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艺术、神话与祭祀》虽然已经尽可能地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叙述，但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起来恐怕还是不会如张光直先生想象得那么轻松。它似乎更适合有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储备或者对史学、考古学或人类学有兴趣并有相当了解的读者。据我所知，在本书首次中译本发行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本书的读者仍以考古学、人类学或艺术史专业的学生及学者为主。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开展和公众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开始逐渐走向公众，越来越多的人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条件借助各种媒介和途径接触考古、了解考古。所以，此类经典著作的读者群体也理当会有所扩大。由于本书写作于20世纪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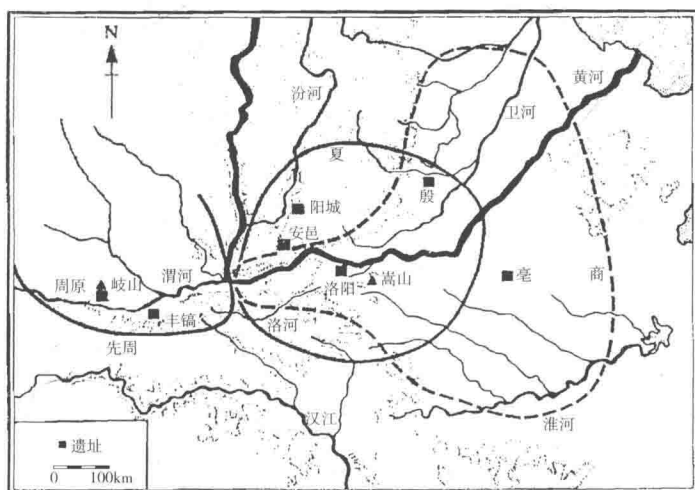
代初，那时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尚处于初始阶段，基础资料和研究方法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此后的三十余年间，关于中国早期社会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我们再次拜读这本著作时，或许会发现书中的一些观点或方法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这也正是张光直先生所希望的。他在第一版中译本的作者前记中曾说，“这本小书是我在这个方面（按：利用多学科的方法、角度和材料来从事中国古史研究）所做的试验中最彻底的一次，同时很自然地也就是最不成熟的一次。因为它不成熟，它更有进一步大幅成长、开花、结实的机会，也就像人在青年，如果努力修习，更可前途无量。不用说，要它有进一步的发展，它更需要读者的批评与建议”，“中国读者的批评与建议更是我所渴望的”。我想张光直先生的这番话绝非普通的客套，而是发自肺腑之言。他希望其所倡导的超出传统的专业局限的跨学科研究，能够得到更多的积极响应，从而真正有益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值得庆幸的是，先生的希望正逐渐变为现实。

张光直先生本身是一部大书，《艺术、神话与祭祀》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若要真正了解张光直先生的学术思想，读懂这本“小书”，希望尊敬的读者再把《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专题六讲》《商文

明》《考古人类学随笔》等著作也一并阅读，当然如果能够读原著就更好。

经典著作是常读常新的。它给读者带来的不仅是新知识、新思想，更为紧要的是贡献给我们认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袁行霈先生在“大家小书”系列的总序中说，“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小书”，篇幅虽小，学术性却“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艺术、神话与祭祀》正是考古学大家张光直先生写给“大家”看的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小书”。北京出版社将其收入“大家小书”系列之中，与其编辑宗旨十分契合。2016年是张光直先生去世十五周年，《艺术、神话与祭祀》的再次翻译出版，不仅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亲近这位杰出的考古学家，也是我们曾经受惠于先生的学人对他的一种追思与纪念！

2016年11月30日



标有夏、商、周三代大致分布区域的古代中国地图

自序

在古代中国，艺术、神话与政治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中国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因素。对古代中国来说，政治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在此，我希望能将考古、文学、艺术的相关资料与其内涵相结合，来阐明这一点。

本书目的有二：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关于这一点，我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在不断地强调。^①

“古代中国”一词涉及公元前近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

^① 请参见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62期，台北，1973年，1页；K. C.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v-xi.

在此期间，夏、商、周三代^①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明。在传统编年体系中，夏起止于公元前2205年至公元前1766年，商起止于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前1122年，周起止于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56年。除“公元前256年”这个年代数据外，其他数据皆无定论。专家们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仅周之起始年代就至少有18种说法。^②就本书之研究主旨而言，这些技术层面的争论并不重要。因其无法定论，本书将采用与大多数数据相近的整数数值来划定三代之年代框架：夏，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商，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100年；周，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56年。

重建夏代之前的中国史前史，依赖于两类证据。第一类证据是成书于三代的文献（大多成书于周代后期）中所记载的关于公元前2200年之前的神话传说。这些传说大都与古代英雄先贤相关，汉代（公元前206至公

① 由于古代中国考古学工作进展迅速，一些关于古代中国的最新优秀研究成果尚未发表出来。西文方面的经典著作有：Henri Maspéro, *China in Antiquity*, tr. F.A. Kierma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8)。另有一部通论是：Jacques Gernet, *Ancient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侧重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K. C.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包含了一系列专题性研究。

② 这18种年代的说法是：1122、1116、1111、1076、1075、1070、1067、1066、1057、1050、1049、1047、1045、1030、1029、1027、1025和1018。请参见K. C. Chang, “China”, in *Chronologi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ed. Robert Ehrich,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 press)。

元220年)将其系统化,称为“三皇五帝”(图1)。关于三皇五帝,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三皇包括伏羲(人类始祖)、燧人(或祝融,火的发明者)以及神农(农耕发明者),五帝包括黄帝(文明创始人)、颡项(开天辟地的帝王)、帝喾、帝尧和帝舜。^①纵观中国历史,这些先贤英雄都是公认的历史名人。近几十年间,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却表明,他们最初基本都是古代宗教人物,只是因为周代后期至汉代用神话解释历史(euhemerized),他们就被演绎成了历史名人。^②

重建中国史前史所依据的第二类证据是考古学材料。20世纪初,对于埋葬于地下的古代人类和文化遗迹的科学考古学由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③史前时代的发展脉络通过考古发掘被充分揭示出来:近两百万年前人类的早期祖先诞生,约四十万年前著名的“北京人”出现,约一万年

① 关于古代中国神话的西方论著有: Henry Maspéro, “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Journal Asiatique* 204 (January-March 1924): 1~100; Derk Bodde, “Myths of Ancient China”, in *Mytholog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ed. Samuel N. Kramer (New York: Doubleday, 1961), pp. 367~408; Sarah Allen, *The Heir and the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1981)。

② 20世纪20年代,经验主义导向的史学家们开始强烈质疑古代中国的传说历史,并成立了“疑古学派”,拒绝承认商代晚期之前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请参见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③ 关于科学考古学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请参见 K. C. Chang,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13 (October 1981): 156~169; 和 Li Chi, *Any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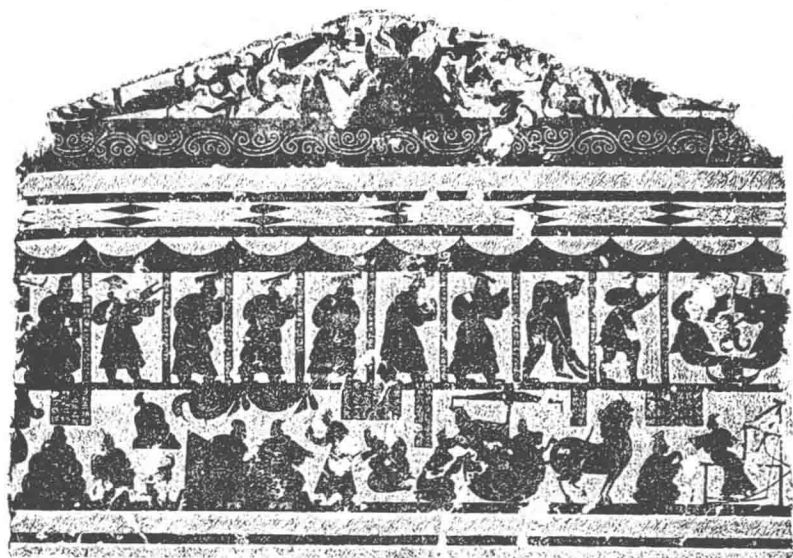


图1 公元2世纪中期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上的中国传说人物（三皇五帝）

中间一行是传说中的英雄先贤及夏代的开国和亡国之君，从右到左依次为：尾部交缠的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火的发明者祝融、手持木铲的农耕发明者神农、文明创始人黄帝、颧頊、帝喾、帝尧、帝舜、夏代创立者大禹和末代夏王桀。

前畜牧和农耕技术开始应用，农业定居村落不断发展，直至三代时期文明社会迎来了黎明的曙光。^①一些史前文化的后段，或许就是传统神话传说中的某些英雄先贤所创造的，但史前人类却并未留下只言片语来记录这些英雄的身份和他们的丰功伟绩。

因为有了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三代成为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严格来说，这并不适用于夏代，因为我们尚未发现夏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然而商周两代确实有此类记载。^②与三代相关的许多晚期文献纷纷为商周时期的资料所证实，关于夏代的记载亦因此比史前时代（夏代之前）更具可信性。这些“晚期文献”主要是成书于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的所谓“儒家经典”：《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经传（特别是左丘明之《左传》）、《三礼》（包括《仪礼》、《礼记》）

① 关于中国史前史的最新综述，请参见K. C. Chang, “In search of the China's beginnings: New light on an old civilization”, *American Scientist* 69 (March-April 1981): 148~160。

② Burton Watson 的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对古代中国文学的考察研究参考价值很高。关于史学研究在利用此类文献时所遭遇到的诸多困境，请参见 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副标题为 “Authenticity and dating of pre-Ch'in texts”。